



世界城市研究精品译丛

驱逐：全球经济中的野蛮性与复杂性

Expulsions: Brutality and Complexity in the Global Economy

[美] 萨斯基娅·萨森 著
何淼 译

...our geopolitical divisions. Is today's sh
...people in sub-Saharan Africa *systemical*
...of the permanently unemployed and fre
...red States? Are the impoverished middle
...ity akin to the impoverished middle c
...these two countries have very different p
...large mining complex in Norilsk, Russia,
...acute toxicity in the area, systemically akin
...lusk mining operations in Montana, United
...long-term toxicities? These facts on the gro
...with o... conceptual superstructures, such as
...ommunis
...ochal... that interest

驱逐：全球经济中的野蛮性与复杂性

Expulsions: Brutality and Complexity in the Global Economy

[美] 萨斯基娅·萨森 著

何淼 译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Phoenix Education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驱逐:全球经济中的野蛮性与复杂性 / (美)萨森
著;何森译. —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2016.3

(世界城市精品译丛)

ISBN 978-7-5499-5663-0

I. ①驱… II. ①萨… III. ①世界经济—研
究 IV. ①F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66091 号

书 名 驱逐:全球经济中的野蛮性与复杂性
著 者 [美] 萨斯基娅·萨森
译 者 何 森
责任编辑 任 晖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苏教网址 <http://www.1088.com.cn>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厂 址 江苏省南京市新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尧新大道 399 号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25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9-5663-0
定 价 48.00 元
网店地址 <http://jsfhjybs.tmall.com>
新浪微博 <http://e.weibo.com/jsfhjy>
邮购电话 025-85406265, 025-84500774, 短信 02585420909
盗版举报 025-83658579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中文版 序

在系统边缘：驱逐

萨斯基娅·萨森

我使用“驱逐”这一术语来描述多种不同的情况。它们包括以下人群数量的不断增加：不幸的贫困群体，穷国内被“仓储”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难民营中的被迫迁移者，富国内被“仓储”在监狱中饱受折磨的“被少数化”群体，在工作中身体受损而年纪轻轻就变得无用的工人，被“仓储”在贫民窟和棚户区中的身体健全的剩余人口。不过，我也纳入了以下事实，即生物圈的组成部分正被驱逐出其赖以生存的空间——并且，我坚持认为，用于描绘气候变迁的话语太过温和，并没有从基础性的事实层面把握住大片死土与死水这一现实状况。

我的论点是，这一系列大规模且十分多元的驱逐现象实际上标志着—一个更深层次的系统性变迁。在多个专业研究中都有关于这方面的零星讨论，但都没有真正地将其描述为一种总体性动力。它将我们带入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以及广泛的全球性破坏的新阶段。作为一个分析范畴，我们需要将“驱逐”和更为人熟知的“社会排斥”概念区分开来。后者发生于一个系统之内，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它可以被减少、被改善，甚至被消除。而正如我在本书中所构想的，驱逐发生在一个系统的系统边缘，这意味着事实上它们或是已经、或是即将处于系统之外。作为本书的关注点，在标志着当前世界的各类复杂系统中，存在着多种系统边缘。这部分地反映了这些系统中多元领域——从监狱和难民营到金融剥削和环境破坏——的复杂性。

在特定类型的发达资本主义发展二十余年后的今天，我们面对是

以双元化动力机制为标志的人类与经济状况。一方面是我们所熟悉的地域重构，它正朝着日益增长的组织和技术复杂性方向发展，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国家激增的全球城市中的艺术空间形态即为缩影；这一极端性升级给排斥在这些财富之外的人带来了沉重的代价（Sassen 2001, 2012 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探讨）。另一方面是一系列混杂的状况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中遭受大规模破坏的土地正在快速增长，而这些状况往往被编码为一个看起来中性的术语——“日益增长的剩余人口”。事实上，这一“剩余”产生于一系列活动引起的领土破坏，其中包括：不加节制的矿业开采，可口可乐和雀巢这类集团的水资源抽取，贫困与疾病，各种类型的武装冲突，因严重腐败以及影响恶劣的国际债务-机制而失去效能的政府。我们还应该加上外国企业与政府机构土地征购的激增，这也额外地造成了整个村庄与小农农业区大规模被迫迁移。

过去二十年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地理扩张与系统深化导致了赢家与输家的野蛮分类。自产生开始，资本主义发展就以暴力、破坏和占有为特征，但也以管制型国家的创造为特征——这是苦苦斗争的工人阶级的胜利，同时还以大量中产阶级的扩张为特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通过吸纳前资本主义经济体而对这些经济体造成的破坏吸引了大量的关注。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这段时期使我们得以看见这一通过吸纳而实现占有的另一变体——正在被一种新型发达资本主义所使用的资本主义现代形式的占有；这一新型发达资本主义被一种金融逻辑所支配，其关注点在于榨取利润而非建设经济。被纳入该命题的是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这一事实，以及由此而来的可能性与需求：前者是指在如今的全球阶段，资本主义关系的延伸可能有其独特的机制；后者是指需要与相对较早的资本主义国家与帝国阶段进行区分。

现在，后凯恩斯时期的系统性逻辑使得我们可以辨认其形态。这一逻辑的一个极端部分大幅偏离了较早时期对人作为生产者与消费者价值的系统性“重视”：夸张一点说，它是对人的驱逐，是为了满足高

级金融的需求以及对自然资源的需求而对传统资本主义进行的破坏——一种资本主义模式破坏另一资本主义模式。例如，为了满足持续的国内需求而进行的开采被简单视作资源运作的传统或惯常逻辑。而实际上，这可能也是为发达资本主义的系统深化奠定基础的新兴方式。例如，由全球监管机构（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实施的结构调整计划。这一计划始于20世纪80年代并在90年代逐步扩大，其影响是通过债务偿还的形式从全球南方国家中榨取了数十亿美元。另一个案例是始于20世纪头十年早期并在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大多数关注集中于出售这些抵押贷款的个人和家庭遭受的巨大损失，以及这一危机将持续至2014年——这确实是值得关注的。在这一案例中，我再次声明了我的论点，除了住房供款与贷款经纪人费用之外，在这里我们还可以觉察到一个更为基础性的新兴动力：为一个有形资产（住房）签订合同（抵押贷款），而与此同时，高层投资者希望一些“真实的”东西而非基于利率的、又接着作为其他衍生品基础的衍生品。因此，开发这一特定类型的抵押贷款，其重点并不在于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而是为了满足投资者对资产支持证券的需求。

我的分析的重点在于，我们可以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将发达资本主义与传统资本主义的关系描绘为以掠夺性动力机制为特征，而非仅仅是进化、发展或进步。^① 在其极端情况下，这意味着使越来越多的人遭受“贫困化”与排斥，而他们不再具有作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价值。但这也意味着小资产阶级和传统民族资产阶级不再具有价值。我将后者视作目前资本主义关系系统深化的组成部分。说得残酷一些，非洲大多数地区和拉丁美洲相当一部分地区的自然资源比这些土地上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人更为重要。这是发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系统深化

① 我在别处（2010）曾检视过马克思对原始积累的分析在何种程度可以解释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关系，这或许可以说明传统资本主义与发达资本主义新形式之间的关系。

的组成部分。在西方国家，我们摒弃了各种形式的凯恩斯主义，而它的兴旺发达依靠的是繁荣的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的加速扩张。这也部分地存在于当今新兴的经济体内，特别是亚洲地区。对于资本主义的深化而言，凯恩斯主义对人作为生产者与消费者价值的重视是至关重要的。

这些系统转向有助于解释一个可以在一系列简单数字中捕捉到的复杂差异。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及以后，负债穷国被要求将其出口收益的一定份额用于偿还债务。这一份额往往在 20% 左右波动，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负债案例中的要求。例如，在 1953 年，同盟国免除了德国 80% 的战争债务，并且只要求其将出口收益的 3%~5% 用于偿还债务。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同盟国对于中欧国家的要求仅为 8%。简言之，关于德国和中欧国家的目标是将其重新纳入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

相比之下，20 世纪 80 年代与 90 年代关于全球南方国家的目标更像一种约束机制。它迫使这些国家参与所谓的“结构调整计划”，其中包括向大型全球企业开放经济，而其影响是对当地小型企业的摧毁。此外，债务偿还被赋予了很高的优先级地位，超越了基础设施、医疗机构、教育以及其他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总的来说，有证据显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执行的债务管理政策使得失业群体与贫困群体的状况进一步恶化。这首先是一种榨取性逻辑。其整体影响是具有毁灭性的，并且大多数参与计划的国家尚未完全恢复过来。

今天，一个更大的历史格局正在形成之中。在我的解读中，它所包含的一个核心元素是在大规模重组的新型全球经济中对非洲的大部分地区、拉丁美洲的相当一部分地区、亚洲的部分地区进行重新定位。日益衰弱的政府、传统经济的破坏开启了生存经济的新阶段。由约 15 个国家和超过 100 个公司主导的外国土地征购快速的全球规模化，使得全球大量地区的“领土”被重新定位为资源基地而非国家空间。这一土地征购的剧增源于对经济作物——尤其是用于生物燃料的棕榈以

及粮食作物——日益增加的需求。另一则是生存经济的范围开始扩大了；其中有一些在许多国家中存在已久，但是今天它们也在全球范围内运作，并常常伴随着从原始业务的一切所得中实现越来越多榨取的“中间人”（商贩、大公司，等等）。

对于一个更大的趋势的组合而言，这些各式各样的发展是其组成部分。第一，现有直接证据表明全球对食物的需求（部分来自于亚洲的新兴中产阶级）是如何意味着来自食物和土地的利润出现了大幅上升。现在，土地和食物的全球市场被大型企业和一些政府所控制。在整个金融危机时期，这都是一个增长部门。在这些情况下，定价是一件受控制的事情，因为这一背景确保了高价格以及食物本身的商品化。第二，对各种类型的金属和矿物的需求仍将持续，其中包括对于迄今为止尚未大量开采的金属和矿物的全新需求，而这一需求来自于近年来电子产品行业的发展。人口密度和建设区密度都远低于世界其他地区的非洲现已成为采矿业投资的一个关键目的地。第三，对水资源的需求在不断增长，并且世界数个地区都出现了地下水枯竭的问题。

当面临着小农和地方商业生存环境的大规模丧失时，贫困群体和新型贫困化群体的生存经济就变得愈发残酷而绝望。全球南方国家沉重的政府债务和高失业率带给它们的是对其他生存方式的需求，不仅为了普通民众，也为了政府和企业。并且，这些国家中不断萎缩的正规经济导致企业和组织更为广泛地使用非法的牟利方式。

这些建设经济的模式带来了死土和死水的大幅扩张。生物圈更新土地、水资源和空气的能力十分出色。但是，这些能力的发挥有赖于特定的时间与生命周期。并且，我们的技术、化学和组织创新的速度远远超过了生物圈修复土地和水资源的速度。我们经济的发展速度与造成的化学污染正变得愈发严重。数据表明，现在的状态已远远超出了生物圈的修复能力。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大片处于死亡状态的土地和水域。这为“人类世”这一理念添加了实质性的注解：一个以人类对环境的巨大冲击为标志的时期。我在本书最后一章中所描述的趋势证明了对生物圈进行破坏的历史与地理发展。这些处于加速之中的发展，

其规模在我们的星球上前所未见。土地、水资源和空气质量所遭受的破坏，对于穷困社区的打击尤为严重。根据估算，这导致全球约八亿人流离失所。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够置身事外。

在序言中我所描述的大部分内容是深层次的具有概念隐蔽性趋势的简略表达。这些趋势横跨了世界不同地区，不受限于地方的政治经济组织类型。正如我在本书中所详细检视的“驱逐”，我们共同创造了凌驾于国家差异之上的种种情况。我们所使用的主要分析范畴——经济、中产阶级、国家等等——在今天的解释力要弱于几十年前。本书的一个重要努力是寻找新类型的分析范畴。例如，当我检视美国蒙大拿的金矿场和俄罗斯诺里尔斯克的镍冶炼综合体——一个属于悠久的资本主义历史，另一则属于悠久的共产主义历史——时，什么对当今时代更为重要呢？或者，在今天重要的东西是否也具有破坏环境的巨大能力呢？又如，我们是否已到达了某一关头，而应将以下种种——长期监禁的囚犯、第三代被迫迁移者的营地、长期无家可归者——也视作对其所面临的共同情况的标识：他们已被驱逐出合理的生活。这并不意味着抛弃用于研究这些领域的专业性范畴。但是，这的确意味着也需要开发出用于跨领域分析的工具。

| 目录

001	中文版 序
	在系统边缘：驱逐
001	引论：野蛮的分类
010	第一章 不断萎缩的经济，日益增 强的驱逐
074	第二章 新型全球土地市场
110	第三章 金融及其能力：作为系统 逻辑的危机
139	第四章 死土，死水
198	结论：在系统边缘
208	参考书目
252	索引
279	致谢

引论：野蛮的分类

我们正面临着全球政治经济时代一项艰巨的难题，即“驱逐”作为一种新型逻辑已然浮出水面。过去的二十年见证了这样的事实：大量人口、企业和空间被不断地从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社会经济秩序中驱逐出去。在某些情况下，如此彻底的驱逐是由简单粗暴的决策引起的，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却是由我们最先进的经济技术成就实现的。“驱逐”这一构想将超越我们所熟知的日益增长的不平等的概念，而构成理解当下全球资本主义病理学的一种路径。此外，它亦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所尊重和崇尚的知识与智能形式往往是一个交易长链的起点，而其终点则可能是单一的驱逐。

我之所以关注驱逐的复杂模式，是因为它们提供了理解我们时代主要动力机制的窗口。并且，我选择的是极端性的案例，因为这些案例使得在其他案例中尚不明朗的东西变得清晰可辨。在西方，一个复杂极端而又为人熟知的案例是将低收入工人和无业者排斥在政府社会福利和医疗体系、企业保险、失业救助之外。较之执行这一驱逐的协议和新法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认清一个极端事实：福利权益享有人群和福利权益被剥夺人群之间的区隔日益严重，并且这一趋势在目前条件下可能难以扭转。以水力压裂法为代表的高级采矿技术的

出现则是另一示例，这些技术将自然环境破坏为死土、死水，将生命的组成部分从生物圈中驱逐出去。较之印度、中国和一些国家的快速增长，本书中我所研究的各种“驱逐”在形塑我们的世界中可能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我的理论的关键是，这些驱逐可以与标准测量所计算的经济增长并存。

这些驱逐是被制造出来的；而制造的工具则涵盖基础性的政策，乃至复杂的、需要专业知识和精密组织架构的制度、体系和技术。金融工具的复杂性激增即为一例，而这是由高明的创意阶层和高等数学制造出来的。然而，当这一复杂性运用到开发一种特定的次贷业务时，则在数年后导致了数以百万计的人群被驱逐出其在美国、匈牙利、拉脱维亚等国的家园。另一个案例是国际契约在法律与清算特征上的复杂性。它使得一个主权政府可以在其他主权国家中获取大片土地，而作为其自身领土扩张的一种形式。例如，在这片土地上为自己国家的中产阶级生产食物，即使代价是会导致对当地农民和传统经济样态的驱逐。再一个案例则是看似卓越的工程学成就，它使我们可以稳妥地从我们的星球中攫取各种所需的资源，却以摧残地表形态为代价。我们日益发达的政治经济体创造出了这样一个世界：在这里，复杂性往往会带来各种初级的野蛮行径。

驱逐的实现渠道则各不相同。它们包括导致希腊和西班牙经济规模萎缩的财政紧缩政策，俄罗斯雅库茨克市和美国蒙大拿州忽视采矿业废气排放的环境政策，以及其他大量案例中的各种渠道，不胜枚举。每个案例的各种具体细节在本书中尤为重要。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更为关注环境破坏而非跨国政策，那么采矿业是重污染源这一事实就比一个开采基地在俄罗斯、另一开采基地在美国这一事实更为重要。

在驱逐这一构想下，我所研究的各种过程与情况具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发展到了严重的境地。世界范围内的各类凄苦的贫困人群固然是最为极端的案例，但我的研究还囊括了各种不同的情况，如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贫困化，如贫困国家内对小农的驱逐——这是由 2006 年以来海外投资者和政府占据其 2.2 亿公顷（5.4 亿余英亩）的土地造成

的，如在美国和俄罗斯这样如此不同国家内的破坏性采矿业。随之而来的则是无数人被迫背井离乡，集中于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难民营，发达国家中沦为少数群体的人群如同货物一般被“仓储”在监狱内，四肢健全的无业人员聚居于各类贫民窟。这些驱逐的状况或已发生很久，但从未像现在这样严重。有一些则是新型的驱逐，如在美国一场仅持续十年的残酷的住房危机中，900万家庭被查封了他们的不动产抵押物。简言之，在不同的社会阶层、物质条件下和世界范围内，这些驱逐的特性、内涵和发生的地点都存在很大的差异。

资本的全球化和技术能力的提升导致放大效应（scaling effects）的产生。20世纪80年代尚算轻微的变化和损失，比如西方和一些非洲国家的去工业化，在20世纪90年代却变成了灾难性的破坏（想想底特律和索马里）。如果我们还是用传统熟知的不平等、贫穷、技术能力等概念来理解这一放大效应的话，则可能会忽视更大的趋势。在环境问题上也是如此。千百年来，我们一直在开采生物圈并造成了各种局部性的破坏；但是直到近三十年来，这种破坏才上升至一种自食其果的全球性事件，并经常对原本和危害来源并不相关的地区造成破坏，如北极永冻地区。其他领域中也一样，虽然细节各有不同。

本书中研究的各种驱逐统合起来是一种野蛮的分类（savage sorting）。我们倾向于将现代社会的复杂组织能力说成是一种创造能够容纳更多复杂性的社会能力，并将其设想为一种积极的发展。然而，只有在部分时间情况是这样的，或者说只在短期内适用。如果将更多的情况纳入考量，拓展暂时性的框架，就会使一个尖锐的边缘变得可以辨识，而正是这一边缘遮蔽了我们对其以外的可能情况的认知。如此便引发了一个问题：当今社会野蛮的单一性（brutal simplicity）倾向是否和伟大的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在19世纪的警告相违背呢？就我的观察而言，复杂性并不一定导致野蛮性，但是它能够导致，而且在当下更是频繁如此。事实上，复杂性经常导致单一的野蛮性（simple brutality），而不是一种对等的全面的野蛮性——即便是负面的，比如当下环境破坏的规模。

复杂性如何产生出野蛮性？我认为，部分答案关乎一个组织性的逻辑，这一逻辑将当今不同领域中的（如全球环境保护与金融）秩序构建系统统合并组织起来。我将以两个案例简要阐释我的观点，这两个案例会在正文中详尽论述。在各国间的环境公约中，主要的政策“创新”是碳交易。不客气地说，事实上，它意味着各国将致力于争取其制造污染的权利，以便在碳交易中购买或出售更高的排放指标。在金融业的案例中，其逻辑业已演化为一种对高额利润的无尽追求和一种对创造金融工具来扩张金融化领域的渴求。这将导致金融业产生一种意愿，即面对那些因金融工具产生反作用而血本无归的群体，金融业也还是想将其生计金融化。美国于2001年启动的次贷业务即是一例。而其目前仍被误解为是一个致力于获得高额筹资利润的金融工程。帮助中等收入人群置业并不是其目的，因此，它是和美国军方教育项目（GI Bill）、美国联邦住宅管理局保险贷款（FHA）^①等数十年前启动的国家工程背道而驰的。推动这些系统和创新发展的能力不一定具有内在的野蛮化的倾向；但当其在特定的组织性逻辑框架下运作时，则会如此。金融业创造资本的能力并非本质上就具有破坏性，然而，这种资本类型却需要接受检验：它可以物化为一个交通基础设施、一座桥、一套水处理设备、一家工厂吗？

这里存在着一大社会性难题。这些能力本应服务于社会领域的发展，致力于社会福祉的广泛化与深度化（其中包括与生物圈的和谐共处）。而事实上，它们往往发挥着相反的作用，如通过极端不平等肢解社会保障，破坏原被自由民主政体许诺的中产阶级生活，迫使弱势和贫困群体背井离乡，并将生物圈的组成部分从其生活空间中剥离。

贯穿本书的一个问题是，我所讨论的各类超越传统的城市与乡村、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东方与西方划分的案例，是否是深层系统动力机制（deeper systemic dynamics）的表象与地方性的样态，而这一动力机制将目前看起来并不关联的种种现象连接在了一起。这一系统动

^① 全称为“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insured Loans”。——译者注

力机制可能是在更为隐蔽的层面上进行运作的，并且其连接种种现象的能力超越了我们在划分时的理解与把握——比如，资本主义经济、共产主义中国、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环境、金融等。我们将不同的情况标签化，赋予其我们所熟知的样态或意义，却不知这些情况极有可能起源于更深层次的、并不为我们所熟知的趋势之中。这一可能性是本书每一章的关键驱动力。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是用隐蔽性趋势这一设想作为具有概念隐蔽性的趋势（*conceptually subterranean trends*）的缩写。如果依靠我们传统的地理政治、经济、社会标识，这些趋势就很难加以辨识。我们都知道，我们正在利用并破坏生物圈，但是我们的“环境政策”却没有结合或反映出对生物圈状况的确切认知。将碳交易作为环境保护的一种方式，仅仅在国与国的关系视角下才讲得通；然而，从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的视角而言，则没有什么意义，尤其是当地方性破坏升级并威胁全人类时。新的动力机制将通过我们所熟悉的浩繁现实——贫困、不平等、经济、政治等渗透开来，从而呈现出我们所熟知的形式，而实际上它们标志着将产生新意义下的催化或断裂现象。

隐蔽性趋势这一设想意欲对我们传统的关于经济、社会及与生物圈的互动等知识类化提出质疑。它将帮助我们评估目前的问题是传统问题的极端化，还是新困难的显现。我要探讨的是，正在发生的各式驱逐是否使得隐蔽性动力机制变得更加难以辨识，而这一动力机制恰恰是基础性事实层面种种驱逐的基础。这一特性，即超越传统分类的驱逐可能性的广泛存在，使我提出了隐蔽性趋势这一设想。对于超越传统分类的隐蔽性趋势而言，专业化的研究、知识和诠释——各有其准则和方法来确立其边界和价值体系，却并不总能帮助我们辨识隐蔽性趋势。然而，专业化分工确实为我们提供了详尽的细节，使我们得以从各类可比较的基础性事物入手。

我并不是要通过理论化赋予各类事实以意义，而是努力通过去理论化（*de-theorize*）的方法将各类事实解构至最基本的元素。通过去理论化，我可以重新审视不平等、金融、采矿业、土地掠夺等问题，以

此发现抽象归类可能遗漏的内容。比如，我所看清的是驱逐这一更为根本性的事实，而非仅仅言及不平等、金融投资、采矿业进展等等。总之，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扎根于各类基础性的事实之中，通过破除长期应用于理解当下趋势的传统范畴的压倒性影响，从而有所发现。

明确地说，我的假说是，虽然全球性的各种危机在不同国家中各有其特殊性，但是在其背后存在着一个由一些最基本的动力机制构成的新兴系统性趋势。基于此，经验研究与概念的重新编码必须并行。在经验研究中，一个现象可能被视为“中国的”、“意大利的”或“澳大利亚的”，即使这些标签化做法或多或少反映了一些特征，但这并不能帮助我们抓住我们这个时代的基因。中国可能依旧保有共产主义社会的诸多特征，但是其不断增长的不平等，以及新近出现的中产阶级贫穷化问题，很有可能根植于与美国一样的深层次的趋势之中。虽然两国之间差异依旧持续，但是两国可能在经济组织上都持有重大的当代逻辑，尤其是以投机驱动金融业，以及对高额利润的迫切追求。对于理解我们这个时代而言，这些相似性及其对大众、空间和经济造成的影响，最终可能比强调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异更为重要。事实上，就更深层次而言，这些“相似性”可能是一些深层趋势的多地点具体表征，而不仅仅是表面化的投机行为和对高额利润的追求。然而，它们至今尚不明显，尚未能够被察觉、被命名并被概念化。与更为普遍的对国家边界放松管制，将边界视为当前变迁发生的场所的关注相比，我的关注点则是国家中全球化趋势的具体表征。

在我看来，这一问题是一种理解方式的分歧。当我们面对当下的各种变迁，如不断加剧的不平等、贫困和政府债务问题时，惯常的理解工具不再具有适用性。于是我们陷入了我们所熟知的解释中：政府的财政管理能力存在问题，大量家庭背负了难以承担的债务，管制过多造成资金分配失效，等等。我并不否认这些解释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我更希望探索的是，是否存在其他发挥作用的动力机制，而不是囿于已经构建好的概念/历史边界。

在本书中，我所研究的大量现实与案例，说明我们现在所使用的

宏大类化存在局限性。尽管存在种种差异，然而不管在社会主义或自由民主政体之下，在非洲或北美，总有一些特有的实践主导着我们采矿业、制造业、人力开发的运作，比如，如何逍遥法外，溜之大吉。这些实践发生于特定的政治经济秩序之中，又被这些秩序赋予各种不同的意义。对我来说，其中的一个问题是这些意义所掩盖的，是否比其表现出来的要多。我将本书中的案例视作基础性的事实，具体化的表征，以便对超越地理政治学分类的具有概念隐蔽性趋势的探究有所帮助。现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被迫迁移人群的快速增长是否和美国的永久性失业群体、经常性监禁群体具有系统性的类似呢？虽然两国政治经济体制不同，但希腊和埃及的中产阶级贫困危机是否具有系统性的类似呢？作为当地长期剧毒来源的俄罗斯雅库茨克市的采矿工厂是否和美国蒙大拿州的佐特曼-兰达斯基矿场具有系统性的类似呢？这些基础性的事实将有助于打破传统的概念性的上层构架，比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

在本书中我所感兴趣的划时代变迁，根源于多种多样且往往较为悠久的历史和谐系之中。但是，我研究的起点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一个无论是全球南方或是全球北方、资本主义或是共产主义经济体都经历着重要变化的年代。我将指出这一浩瀚历史时期的两个重大转向，以此作为这个时代的注解。这两个转向席卷了整个世界，但在不同的地点演化出了各自不同的特征，而正是这一特性使得这些转向成为本书一个有价值的研究背景。

其中一个转向是，从物质层面而言，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区正在发展成为致力于关键经济运行的极端地带。其中一端表现为制造业、服务业、行政事务的全球外包，人体器官的移植，以及在低成本、弱管制地区种植经济作物。另一端则是，全球范围内都在积极地将全球城市打造为实现先进经济功能的战略性空间，其中既包括从无到有的新城，也包括经过野蛮更新的老城。全球城市网络发挥了新的地理中心的功能，打破了传统的南-北和东-西划分，外包地区的网络亦是如此。